



【底层行走】

记工

□张刚

整理书桌,从书堆里翻出一个巴掌大的塑料皮笔记本来,纸已发黄发脆,最后两页是手绘的一个简易表格:日期、工分,分成两栏,对应的方框里打着圈圈叉叉,这是父亲当年在建筑队打工的记工凭证。

时间回到三十年前,那时父亲的腿病刚好,可以外出到建筑队打工了。作为一个木匠,他按“大工”计酬,去干一整天就记一个工,要是上午种地下午出工,就是半个,一个工的酬劳是10元,在当时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。

父亲不识一个字,也不会记账,妈妈叮嘱正在上中学的姐姐找个小本子记在上面。这个小笔记本是小学毕业时同学送的,我在上面摘抄着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,有诗词,也有歌曲,还在边边角角贴些小邮票作装饰。妈妈说要给爸爸记工分,怕记在纸上丢了,我便把小笔记本拿出来,姐姐在最后两页画好表格,开始记工。家里的厨房里还有一眼小小的炕,属于姐姐,这本小笔记本就压在了她的枕头下。

每到晚上,我们从学校回来了,姐姐坐在炕上背书,妈妈在灶前忙碌着,一家人留意着院子里的动静。

天黑了,大门哐当一声响,父亲的脚步声便在院子里响起来,声音也传了进来:“饭熟了没有?”

妈妈在厨房里应声回答:“熟了熟了。”又不忘叮嘱一声:“把你爸的工给记上,别忘了。”姐姐便从枕头下面抽出笔记本,写上日期,标上工分,再压回枕头底下。

这意味着,父亲又给家里增加了十元钱的收入。

那时父亲腿病刚好,村里一位匠人特意照顾他,才让他加入到这支民间建筑队。他们四处托人找关系,延揽了乡政府、中小学校的一些房屋维修的活,给“公家人”干,泥瓦匠们的社会地位也仿佛抬高了,虽然累,但工钱有保障,走路腰板也就能直起来了。

建筑队上有一个读过几年书的人,他统一来记工,但是母亲不放心,叮嘱姐姐再记一份,万一工地上记错了呢?庄稼人的力气不值钱,但干一天活到手的钱可是很值钱呀,那时一袋磷肥也才十元,少记一天,一袋子磷肥就丢了。

父亲紧紧“钉”在建筑队,只有农活特别忙不得不需要他来干时,才抽半天地,地里的活便全落在了母亲身上,我们还在上学,回到家里就赶紧帮母亲挑水烧火,周末也下地干些农活。

父亲每天回家很晚,天黑透了,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走。有时天太晚,母亲对我说,去路边看看你爸到村口了没,到了喊一声,我下面条。

朦胧的夜色中,一看到父亲疲惫的身影出现在村口的斜坡上,我赶紧飞跑着回家,在大门外就喊,我爸回来了,赶紧下饭。

灶台的蒸气透过厨房窗户向外飘散,昏黄的油灯中,雾蒙蒙的一片。姐姐照例从枕头下抽出笔记本,记上一个工分。有一天,父亲站在厨房门口看见了,便问:“几个工了?”

姐姐说:“十个了。”

一家人都很高兴,意味着已经有一百元的收入,公家的钱到年底会一分不少地结清,能踏踏实实地过年了。

父亲在黑暗中抬起头,想了一会儿说:“按计划,这次要干一个月,现在干了近一半的活,再赶进度,一天多干一个多小时,总共二十六七天就能干完,差不多一天领12元。”

每天晚上,父亲回来了,工分也记好了,家里才能开饭。一碗面条一碟咸菜就是丰盛的晚餐,父亲照例要吃四大碗。他一边吃饭一边和母亲商量说,今年有公家人的建筑活,钱能到手,种小麦的化肥钱就有了,今年要多买一袋化肥拌种子,明年就有好收成。他还说,买了化肥要是还稍有宽裕,再留出明年买猪崽的钱,养一头给孩子们过年。吃完饭收拾碗筷时,他还说,今年就把两只公鸡养肥点儿,要不过年没点儿肉腥,几个娃馋呀。

我们都盼望着公家人的建筑活儿能多些,父亲就可以多挣钱,可是乡镇上的公家人的活儿很少,有时一年也不见有一两次,这次干了一个来月,真是大“工程”了。

不到一个月,这“工程”果然赶完了,最后计算工钱,一天值12元!这在当时绝对是最高工价了。“工程”验收后,先核对工分,父亲将工分一对照,果然比家里记的少了一个半工。父亲拿着这个小笔记本,到了工地上,两下一对照,原来缺的两次是记工的人自己没来工地,第二天补记不准确。

但还得找其他工友来证明是否真来干活,于是便根据日期,努力回忆那天干了些啥,总之这工分是对上了。父亲很释然,又把小笔记本拿回来,感叹说,还是读书好,要不是家里有读书人,这工缺了也找不回来了,一个半工18元,要是没有这建筑上的活,从哪儿挣去?

小本子完成了它记工的历史使命,它里面最后两页是父亲早年的工资条呢,仿佛更是家里一个功劳簿,我就一直保存着,随着时间的流逝,它也慢慢地老了。毕竟,这样可以记工的“工程”不多,大多是零零碎碎的、一天半天的零活,有时不用在本子上记当天就结了工钱,有些到年底也要不来,也就慢慢地忘掉了。

发黄发脆的几页纸,就是生活沉甸甸的记忆,生活的艰辛和幸福跳跃在工分的小格子里,飘散在夜色中父亲的身影里,氤氲在母亲厨房的蒸气里。这一家人的念想和期盼,正如这一个一个、半个半个地,一笔一笔增加起来的工分,那是凝结着一家人全部的希望,在生活的热气中升腾。

所谓生计,大约也就是这小本子上凝结希望的一笔一笔吧。

【城市地理】

永恒留念的皇宫照相馆

□杨曙明

昔日济南有二十多家照相馆,就开办时间而言,皇宫照相馆不是最早,但名气却是最大。《1934·济南大观》中就有“皇宫是济南摄影的权威者”之记载,而且“价目极廉,卡纸、相版俱属摩登,放大、设色更为特长”。

皇宫照相馆创办于1932年,创办人叫张鸿文。他是历城人,虽说出身贫寒,但为人处世却颇为精明,早年曾给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当过司机。韩复榘是冯玉祥的嫡系将领,其主政山东后,就让张鸿文当上了济南市的工务局局长。那时候工务局的主要职能是负责市政建设,因而张鸿文在任内也积攒了些钱财。宽厚所街是济南老城内第一条柏油路面,据说这与张鸿文家居此街有关,此乃题外话,在此不多赘言。

当时工务局机关设在天桥西。一日,张鸿文与下属到位于经二路上的鸿文照相馆去照相,因为照相馆名称与他的名字相同,让他颇感兴趣,而无意间的聊天又让他了解到照相馆投资少、占地小,既干净又赚钱的内情,而且还能交朋结友,接触上层人士,于是,他便由此萌生并决意出资开办一家照相馆。

过后不久,张鸿文即以每月33块大洋的价格,租赁下了房主车迈平的三间门头房。这处房屋是两层小楼,位于经三路纬四路,中山公园北门以东,也就是今日“皇宫”现址。选址此处原因有二:一是附近商业繁华,有利于开展经营活动;二是距离工务局较近,方便他照管。承租下店面之后,张鸿文便利用职务之便,请来能工巧匠,对店面进行了改造装修,并修建了玻璃房。经过整修后的门面颇有特色:两大四小的六根半圆浮雕龙柱并排而立,上有“皇宫照相馆”五个猩红大字,周边彩色灯泡点缀,颇有些“皇宫”的味道。同时,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,他还购置了最为先进、最为时尚的照相设备,并从北京聘请来两位高级技师。不过,张鸿文身为公职人员,不便过多地抛头露面参与经营活动,于是其父张学慧就成了“皇宫”的经理。

开业之后的皇宫照相馆,果然生意兴隆。其经营业务除了室内人像之外,还能承接室外照相和转机照相等。当然,其生意兴隆,除了照相质量好、服务周到之外,与张鸿文的权势、关照也密切相关。他不仅经常出面为“皇宫”揽些生意,而且逢有军政要员、社会名流、上层人士和社会团体来济南访问或视察,还会利用职务之便,承揽下照相留影的业务。他还经常邀请并陪同一些军政要员到“皇宫”照相,并派自己的车辆迎来送往社会名流。如此这般的周到热情,“皇宫”的生意自然是红火。再者,韩复榘这座靠山对“皇宫”的关照也是不言而喻的。

当年“皇宫”也做广告,其广告读起来颇有些意思:“高堂双亲,容面慈祥;儿女乐趣,活泼满堂;新婚燕尔,琴瑟和畅;兄弟雁序,埙篪同章;良朋盛聚,曲水流觞;游山玩水,混俗和光,皆人生之乐事也。请君即赴商埠公园东,皇宫照相馆摄影以留纪念庶不致。俯仰之间,已成陈迹,皇宫是济南摄影界的权威者,艺术超群,设备富丽而价目极低廉。”

“七七”事变爆发后,全面抗战迅疾展开,张鸿文随军南下撤离了济南。日寇占领济南之后,济南的民

族工商业随之陷入萧条,皇宫照相馆也未能幸免,而且日伪宪兵对照相、报刊、书店等商家盘查得还特别严厉,照相馆每天都必须要把当天的照片送到宪兵队去接受检查,如有不从,就会被以“不法刁民”论处,轻则勒令关门停业,重则逮捕判罪入狱。皇宫照相馆在这萧瑟寒风中,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,可是时间长了,张学慧年事已高,实在无力应付名目繁多的检查和盘剥,也就无心继续经营,有了转让“皇宫”的想法。容彰照相馆的技师白树元、王誉重得知这个信息后,便合资5000元,成了房东车迈平的新房客。同时,还以每月3袋面粉的价格,将“皇宫”的全部设备及玻璃房也租赁下来。在添置了部分设备之后,他们重打锣鼓另开张,将皇宫照相馆更名为“皇宫昌记照相馆”,以示与此前的区别,这是1942年4月间的事。

白树元、王誉重是照相的行家里手,接手“皇宫”之后,他们分别出任正、副经理。二人事必躬亲,处处精打细算,几个月后便让“皇宫”呈现出“回暖”迹象,一年后便又逐渐红火起来,并成为济南照相业的“龙头老大”。尤其是白树元,在1943年还出任了“济南照相业同业公会会长”,并一直任职到1956年公私合营之时。昔日泉城路上有家名气很大的“人民照相馆”,其前身是“瑞昌照相馆”,这“瑞昌”就是白、王二人在1943年末,为了扩大经营而投资创办的。

1945年秋,日寇投降的喜讯让全国人民喜不自禁,济南市民纷纷到照相馆拍照留念,“皇宫”为此更加红火起来。白树元和王誉重还借国民政府接收日本企业之际,廉价买进了一大批照相器材和日本军用照相机,然后反手进行了倒卖,从中获得了高额利润。同时,为了防止张鸿文回来之后收回“皇宫”,他们就从房东手中买下了“皇宫”的房屋产权,由租客成为房主。1947年秋,张鸿文果然回来了,当他得知“皇宫”的现状后,虽然暴跳如雷,并大发雷霆,但限于白、王二人已经成为房主,收回“皇宫”已不可能,所以最终经过中间人协调,白树元、王誉重向张鸿文赔礼道歉,并给予适当经济补偿算是了结了此事。

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,“皇宫”的经营依旧较为红火。1956年公私合营之后,“皇宫”变身为国营企业,并被评定为山东省照相业两家特级店之一,成为全省荣誉最高的照相馆。当年毛泽东、朱德、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济南视察时,都曾由“皇宫”的摄影师们为他们拍照留念。1959年,主管部门用原“同生照相馆”的铺面,置换、扩大了“皇宫”的营业面积;1970年,又拆除了楼后的旧建筑,盖起了新楼,成为“皇宫”今日之规模。1966年皇宫照相馆曾改名为“红艺照相馆”,是当时济南唯一一家获准扩放毛泽东像的照相馆。1987年,“皇宫”复名,门面经过整修,也恢复了原来那种古色古香的容貌。

上世纪90年代之后,人们的社会生活逐渐进入数字化时代。先是机械相机被数码相机所取代,而后数码相机又很快被智能手机所取代。济南众多老字号照相馆,在巨大压力下纷纷关门歇业,唯有“皇宫”等少数几家,能可贵地坚持下来。他们坚守传承和与时俱进并举,让“皇宫”成为目前济南最老,也是保存最完好的照相馆。